责任编辑:蒋一兵 E-mail:jiangyb@ccps.gov.cn

学术思潮

■当代思潮

科学理性主义：追问“什么是科学”

□丁东红

科学理性主义是当代西方哲学的主潮之一，这一思潮同近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有着不解之缘。一方面，科学理性主义对认识论、方法论问题的思考得益于自然科学层出不穷的新成果；另一方面，这一哲学思潮所提供的现代科学观又引导着科学大踏步地前进。

所谓科学观就是对于科学理论的总体认识，亦即对于“什么是科学”的回答。近代以来，科学以它给人类带来的滚滚财富和给社会带来的巨大进步而令人肃然起敬，凡是被称为科学的东西，没有人会怀疑它的正确性和真理性。那么，科学理论真的是铁板一块、永世不变的吗？现代科学理性主义思潮的发展恰恰在科学观上接二连三地打开了缺口，拓展并深化了我们对于科学理论的认识。

当逻辑实证主义运用经验证实原则去论证科学的客观检验标准时，遇到了难以逾越的逻辑困境：经验证实的东西总是具体的、个别的，而科学理论所陈述的却是一般原则和普遍真理；经验总是已经过去和完成的事情，而科学的作用范围却包含着未来。这样看来，经验是无法满足科学理论的普遍性要求的，实践经验和理论品性发生了冲突。我们既不能无视经验的存在，也不能放弃科学的追求，所以只能再次追问，到底什么是科学？传统科学观在这里受到了挑战。波普的批判理性主义通过逆向思维另辟蹊径，提出证伪原则：经验虽然不能穷尽一切事例，却可以通过一个反证推翻一个科学理论。欧洲人的经典命题“凡天鹅皆白”不是被澳洲发现的一只黑天鹅证伪了吗？可见经验并非同科学的普遍性无关，只不过这是一种否定性的关系。波普进一步指出，一切科学探讨首先同问题相联系，是针对问题而生的，所谓科学就是解释问题的一种理论模型或者理论假说。当这种理论模型或理论假说能够正确地解释和预测客观事实时，它就是科学；当客观现实的发展超出了它的解释范围时，它被证伪了，就需要有新的理论假说来代替它。因此，科学发展的模式是：问题——假设——证伪——新的问题……批判理性主义的证伪理论在科学观上给了我们一个启示：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不是绝对的，科学理论不仅具有实证性的品格，同时也具有否证性的品格。科学只有通过不断清除假设中的错误才能前进。所以，任何科学理论都应该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它只能在不断的更新中呈现自身的真理性。

科学哲学的历史主义学派继续考察科学的理论模型，拉卡托斯的“科学革命纲领”主张，可以把科学理论看成一个由硬核和保护带组成的模型。硬核是基本理论，是不容动摇的；保护带是辅助性假设，可以部分调整甚至全部变换。任何科学理论模型都不是永恒的，都有一个从进化到退化的演变过程。只要保护带的调整能够应对客观世界的变化并为该模型增加新的经验内容，能预言和解释新的事实，这个理论模型就是进步的；反之则已经退化。这样，一个科学理论是不会轻易被一、两个反面例证所推翻的，它总要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发挥作用。这在科学观上给了我们又一个启示：科学的本质是同它的历史性相联系的，应该用动态的眼光来看待科学的标准。也就是说，静态的逻辑模式需要动态的历史模式来促动，横向的科学结构角度需要纵向的科学发展角度来引领。科学哲学所获得的历史主义眼光在其他西方哲学流派中也有反映，像心理哲学派别的“发生认识论”观点，解释学的“效果历史”观点，都是向历史主义的靠拢。可见历史主义的研究态度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原则，同时也是人类现代思维的共识。

夏皮尔的科学实在论给了我们科学观上的第三个启示，他提出了信息域的概念，信息域即一系列有内在联系并产生重大问题的信息群落。比如，拉瓦锡发现了氧，把燃烧、金属熔炼、动植物呼吸等现象统一于化学的信息域。信息域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如果说，16-17世纪是力学的信息域，18世纪是化学的信息域，19世纪是电磁学、热力学的信息域，那么，20-21世纪很可能是微电子学、分子生物学的信息域。我们可以站在信息域的总体高度，从各门科学的相互联系和互动关系中发现科学新的生长点，科学发展有了新的思维角度。现代科学实践的形式，已经远远超越了科学家的个人奋斗，电脑行业三、五个月改换一个朝代的发展速度，靠的是几百万科学技术人员的集体智慧。现代科学的形态也不再是一个个孤立的理论体系，而更体现为由众多理论或学科构成的理论群集。这一思路的实质告诉我们，现代科学是整体性的事业，而不仅是个人理性活动的结果。

开放观、动态观、整体观，以及发展观、系统观、均衡观、回馈观、模式观等等，这些来自科学理性主义的新观念不仅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科学观，而且促使现代思维方式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除了逻辑思维、辩证思维，还有逆向思维、模糊思维、发散思维等等，这些都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当代西方哲学思潮之一）

■思想库

思想库的产生和发展

□穆占劳

现代意义上的思想库产生于二战以后的西方发达国家，它们在各自国家的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多方面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国家内外政策制订过程中的作用日益凸现。作为现代政治的产物，思想库是为适应现代社会高度发达的需要和满足现代国家日益复杂的决策需要，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首先，自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科学和理性的观念得到确立并逐渐巩固，专家的权威地位得到确立和承认；社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使得劳动分工不断细化；公共决策的作用和功能不断凸现，这是现代咨询制度和机构产生的思想背景和社会土壤。

随着产业革命的不断发展，人类迎来了大工业化和科学化的时代，专业化分工越来越细，人类面临的各种现实问题越来越复杂，社会生活的系统化和多元化程度不断加深。继承启蒙运动的科学精神和理性精神，在这一时代中，科学思想和方法日益受到人们的尊敬和肯定。由于政府组织单靠一己之力已无法应付面对日益复杂化和系统化的公共决策和管理问题，这时专门为决策服务的各类咨询研究机构便应运而生。这些机构由各方面的专家组成，专门出卖自己头脑中的专门知识和专业经验，为各类社会机构服务，因此作为社会化的一个产物，现代思想库自产生之日起就形成了产业化经营的传统，并且成为市场经济中一个特殊的角色。

二战以后世界经济、政治形势巨变，各国综合实力的竞争日趋激烈。西方经济在持续发展中出现了越来越严重的问题，政治民主化的浪潮不断，各类社会问题丛生，面对如此复杂而专业的公共问题，如何科学决策成为政府头等重要的课题。为了制订出有效的政策，解决各种复杂的现实问题，政府便开始较大规模、较大范围、较深程度地求助于各类咨询研究机构，于是思想库便陡然走俏，蓬勃发展，直到今天仍然方兴未艾。

其次，现代西方思想库的兴起与繁荣还有制度上的保障。其中，行政上的委托制度和相关的法律制度比较健全是重要的原因。制度背景是西方思想库体系繁荣发展的前提与基础。

形式各样、规模不等的思想库能够发展，关键的问题是它们有介入政府决策的途径。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其行政体制中的委托制度根深蒂固。一方面，一个总统从竞选到执政，在其国内外政策的形成过程中，总能看到思想库和智囊人物的影响。由于总统具有多项人事任免权，他可以任命一些政府官员，直接进入政府决策系统。在这一过程中，某些思想库的研究人员往往会成为总统候选人的竞选班子成员，而一旦该总统候选人问鼎白宫，就为这些思想库的研究人员参与政府决策提供了必然与合法的途径。另一方面，每届新政府在执政过程中，出于科学决策的考虑，也会把一些复杂而重大的决策问题委托给一个或几个思想库研究。思想库接受政府的委托金，组织专家学者进行研究后提出政策报告来为政府服务。

此外，有关思想库发展经营的法律制度比较健全。在国外，思想库是一种提供智力服务的特殊的市场法人主体，它的生存和发展有一系列的法律制度作保障。因为思想库大多都是非赢利的机构，因此国家在包括资金、税收等方面都有一系列的优惠政策和法律规定。经过长时间的发展，这些法律也日渐健全，思想库的行为与运作也日渐规范。

再次，西方政治制度中权力的高度分散也是思想库产生和发展的一个原因。例如立法和行政两者之间的关系，国会和以总统（或首相）为首的行政部门分别由不同的选举渠道产生，两大部门互不从属。因此，国会与行政当局的政策意见常常不一致，甚至发生冲突。这就为思想库各展其能、各施影响提供了可能。而国会中所讨论、审议和立法的问题涉及内政、外交的各个领域，内容可谓无所不包，议员们不可能每人都具备方方面面的专门知识，这就势必需要借助思想库这一“外脑”。有需求才有供给，思想库的存在和发展正好适应了西方国家“政治市场”的需要。因此，思想库之所以能存在和发展，其影响力之所以大，可以说西方的政治制度为之提供了相当广阔的活动空间。

从政治制度的另一个方面来看，国会议员和行政官员由于受党派政治、利益集团和选民的影响，他们都有各自特殊的利益权衡，因此其拟订的政策就难免有失公允。而云集了大批专家的思想库大都自称超党派，因此，对决策者和选民来说，思想库的政策建议颇具中立性、民主性和权威性。

最后，社会科学不断面向社会现实问题并研究、解决这些问题，参与政策制订也是思想库繁荣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政策研究是20世纪中叶以来的重要课题，人们越来越关注公共政策的制订过程，并且随着媒体的迅速发展，公众对公共政策的监督和批评变得更容易了，政府和领袖如同金鱼缸里的金鱼一样受到人们的关注，在制订政策时只有更加小心翼翼，才能避免公众和舆论的不满。于是，政府就特别需要能在政策制订的研究方面有专长的咨询机构。二战后，随着大批的社会科学专家和学者不断走出“象牙塔”，学术问题从“经院化”走向实用化，以社会现实问题为研究对象，来向政府决策提供咨询服务日益成为研究机构的共识。从政府决策来看，思想库能够围绕政策制订而进行研究，能发挥收集材料、处理信息、提供方案的专长，有利于领袖们科学决策。从思想库的角度来说，集合一大批知识界和政界等领域的精英人物，运用他们的知识和能量，发挥整合优势，集中攻关，群策群力，建言献策，为政府和社会服务也成为它们的主要宗旨。实践表明，很多思想库在政策规划方面已经获得了公众的支持和认可，并且引起了政府和领袖的注意，其影响也日渐声隆。从西方各国的情况来看，最知名的思想库，多半是在政策研究方面成绩斐然的。比如美国的兰德公司、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等，英国的国际战略研究所，都在对内对外政策咨询方面颇有建树。

自从思想库产生以后，这种新型的、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决策研究和咨询机构很快为人们所接受，并且成为西方国家政府决策环节中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角色。因此，关注和研究西方思想库一定会为我们观察、分析西方发达国家的国内外政策打开另一扇窗户。

■学海泛舟

译康德著作 昌理性精神

今年是康德逝世200周年，全世界都在纪念这位伟大的德国哲学家。恰逢此刻，邓晓芒和杨祖陶老师合作伏案七年，从德文原版直接翻译（邓晓芒译，杨祖陶校）的康德的主要著作三大批判即《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三本书共计100万字终于由人民出版社出齐了。本文是邓晓芒教授翻译、研究康德著作的体会。

□邓晓芒

康德哲学正式传入中国大概要从梁启超1903年连载于《新民丛报》上的长文《近世第一大哲康德的学说》算起，恰好是康德逝世之后的一个世纪。而从那以来，历史又翻过了第二个100年。回顾这100年，国人对康德哲学的兴趣从来就没有消失过。即使是在万马齐喑的文革时代，康德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来源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以及“新康德主义”作为“修正主义”的理论鼻祖，也成为人们经常谈论的话题。1980年代初李泽厚等人提出的“要康德、不要黑格尔”更是把康德哲学提到当代中国一大显学的地位，加上海外牟宗三及其弟子借康德来张扬“新儒学”的思潮对大陆学术界的渗透和鼓动，到今天，即使是哲学圈外的人士写文章，如果不引用或胡侃几句康德，似乎就不上档次。然而令人奇怪的是，一百年来所有这些关于康德的喧哗，基本上都是建立在二、三手资料甚至道听途说的基础上的。绝大部分人引证康德所依据的本子，都是康德著作的英译本或从英译本转译过来的中译本。长期以来，中国学人都为没有一个信得过的直接从德文译过来的三大批判中译本而感到困扰。1980年代初国家曾拨款立项，组织了一批人做这件工作（《康德全集》），但20多年过去了，至今没有下文。对照日本学界，他们早就有了康德全集、费希特全集、黑格尔全集等等。我们正是怀着这样一种为中国学术界“争口气”的情绪，才不惜放下别的似乎更有兴趣的工作，专门来做这件枯燥而没有明显效益的事。

然而，光靠情绪是成不了大事的。应当进一步追问的是：为什么我们对待康德哲学（对待其他人的思想也是一样）如此浮躁、如此不求甚解？显然，这与我们在理论上的急功近利而缺乏对理论本身的尊重有关，也就是与我们缺乏严格的理性精神有关。其实我们翻译康德的书，一个更重要的考虑是想要通过康德思想的介绍和阐发，提倡一种中国文化中历来所缺少的理性精神。康德的三大批判正是这种理性精神的一个绝佳标本。有人会说，中国传统中并不缺少理性精神，如老子哲学和宋明理学，都是强调“天理”、“天道”而压制人的感性和“人欲”的，甚至还有人认为中国不是理性太少，而是理性太多了，所以不少人宁可借尼采、海德格尔和西方非理性思潮来冲击中国受到“天理”束缚的心灵。其实这都是误解。中国的“天理”并不是理性，而恰好是非理性，并不是要讲“道理”，而恰好是不讲道理，是预设了某些不讲道理的前提再来和你“讲清道理”，即讲清你必须服从不讲道理的前提的那个“道理”。如果你想和那个前提讲道理，那就和你没有道理可讲。所以中国传统的“理”是每个人必须无条件服从的“天理”。

西方的“理性”（reason，Vernunft）则首先是指人的一种“能力”，“人是理性的动物”就是指人天生赋有这种能力。这种能力有两个方面，即把握普遍规范（逻各斯）的认识能力和超越现存事物的实践能力。这就是古希腊的“逻各斯精神”和“努斯精神”（logos和nuos这两个希腊字都可以译作“理性”）。由此而引伸出西方人对逻辑（logic，来源于logos）和意志自由的双重的关注。可以说，西方思想和哲学的全部问题意识都是由这两种精神的互相冲突、缠绕和调解而造成的。周国平先生曾说西方人讲究“思想的认真”和“灵魂的认真”，即对思想的精密严格（逻辑理性）和对人生的终极关怀（宗教超越），也是这个意思。只不过“灵魂的认真”并不仅仅体现于宗教信仰，而且也体现为理性的怀疑，即超越现有规范或教条对尚未探讨过的领域进行试探。甚至有人认为理性精神最主要的就是怀疑精神，这有一定的道理。因为怀疑就是超越。但怀疑是为了确证（信仰），而要确证自己的怀疑，在没有任何现成的教条（它们全都被怀疑所摧毁）可以依靠的情况下，就必须身体力行地去尝试和实践，去自由地冲撞和创造。这种实践和中国古人所讲的“知与行”的关系是截然不同的，中国所谓“践履”主要是指实行某种既定的道德信条或天道原则，而非自由意志的自立法度（即康德所谓“自律”）。可见中国传统中除了缺乏对逻辑和认识方法的严密审视和探讨外，也缺乏对天经地义的东西的认真的怀疑和试探。中国式的怀疑只是逃避问题的借口罢了。孔子的“子不语”，荀子的“不求知天”，庄子的无是无非，郑板桥的“难得糊涂”，至今还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文化心理。以这种心理，怎么会有兴趣、有耐心去研究外国哲人究竟说了什么和想说什么，并将他们的思想原原本本地翻译成汉语呢？

康德三大批判所展示的正是西方理性精神的一个全面的景观。《纯粹理性批判》在人类科学知识方面穷究至极，追溯到它之所以可能的最高前提，为解决认识论问题而建立起他的创造性的“先验逻辑”；《实践理性批判》在人的自由和道德实践方面把人置于超越境界，为人类高于动物的生存方式树立了绝对的尊严。这两种“理性”都是人所固有的先天能力，人不仅为自然立法，而且为自己立法。所以康德说他自己的全部哲学都可以归结为“人类学”。《判断力批判》则是把这两种分离的理性能力结合为人类追求自由的活动（审美活动和历史活动）的一个统一过程。探讨康德三大批判中的理性精神及其微妙结构，对于我们今天的社会文化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光大银行成都分行
向四川省部分党政领导干部
赠送2004年《学习时报》

■社科前沿

新增长理论对人力资本理论的发展

□杨雪冬

人力资本理论是与人才资源开发关系最直接的理论。它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强调人的知识与技能在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中发挥着关键作用，而国家可以通过投资和制度建设提高人力资本的质量。

古典经济学虽然也谈到人的知识和能力在生产中的作用，但在总体上一直把物质因素作为经济增长的惟一源泉，没有认识到经济发展主要取决于人的质量，而不是自然资源的丰瘠或资本存量的多寡。二战后工业化国家经济的高速增长证明了这种认识的缺陷。许多经济学家发现，资本存量和劳动力数量的增加只能说明经济增长速度的一小部分，起决定作用的是人的质量。只有实现人力资本投入和物力资本投入的均衡，才能推动经济的持续增长。如果只重视物质资本的投入，缺乏对人的能力的投资，就会造成物资资本与人力资本投入的不配套，产生经济增长的“瓶颈”。换句话说，低质量的人力资本会从根本上制约物力资本效率的实现。

这种认识改变了把人力资本投资看作纯消费的观念。围绕人力资本进行的包括教育、卫生保健、人力资源市场的建设、知识产权的保护在内的各种形式的投入都是生产性的。这些投入收效虽慢，但是一旦发生作用，其经济效果可以超过其他投资。相同的费用，用于提高劳动者的质量比起单纯地增加生产设备和劳动者的数量，更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劳动生产率一旦有新的提高，便可以加倍的速度增加社会财富。

人力资本理论对于人才资源的开发有两方面的突出贡献。一是它明确了人力资本投资是生产性投资，是回报率更高的投资。人力资本论者主张“全资本”概念，即资本除了包含物质资本外，还应包含人力资本。舒尔茨和贝克尔等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收益率进行测算，结果表明，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收益率大大高于对物质资本的投资收益率；二是人力资本投资是多方面的，根本目的是提高人力资本的质量和人力资本的合理流动。而教育是众多投资中的核心。舒尔茨用收益率的方法计算了教育对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33%，丹尼森进一步定量研究了人力资本对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23%。自1994年起，世界银行对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国家财富进行了初步计算，结果表明：除中东和少数资源型国家外，其他国家的人力资源在国家财富中所占的份额都在60%或以上。

尽管人力资本理论强调了对人的投资，但是并没有给予知识、思想、理念等因素应有的足够重视。而随着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这些因素恰恰是更重要的。1980年代后期，卢卡斯、罗默等人提出的新增长理论弥补了人力资本理论这方面的不足，从而把人力资本作为一个独立的因素纳入经济增长模式中，使之内生化、具体化。卢卡斯将资本区分为有形资本和无形资本，并将劳动力划分为纯体力的原始劳动和表现劳动技能的人力资本，认为只有后者才是经济增长的源泉。而人力资本的积累途径有二：一是通过脱离生产的正规和非正规学校教育；二是通过生产中的边干边学，工作中的实际训练和经验积累。卢卡斯认为舒尔茨的人力资本产生的是人力资本的内在效应，而边干边学产生的是人力资本的外在效应，这无疑拓宽了人力资本形成的途径。

罗默认为生产要素应包括四个方面：资本、非技术劳动、人力资本和新思想。其中人力资本是按接受教育的年限来衡量，而新思想是指特殊的知识，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知识的生产要投入人力资本和原有的知识积累，积累的知识越多，用于生产知识的人力资本的边际产出率就越高。专业化的人力资本不仅自身具有收益递增的特点，而且会使资本和劳动等要素的收益递增，形成“收益递增”的增长模型。

将卢卡斯和罗默的模型推广到开放经济，可以得到内生技术进步增长理论的政策含义。一个国家要实现经济增长，关键是提高人力资本的存量，突破某个界限，走出人力资本存量低与经济增长慢循环的“低水平陷阱”。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扩大开放，推进贸易等措施来提高本国人力资本，利用知识溢出效应在短时间缩短与发达国家在知识积累上的差距。

新增长理论强调，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增长差异不仅反映了它们在技术能力或自然资本上的差异，也反映了人力资本——知识和技能资源的差别。“理念差距”与“物质差距”同样重要。1992年罗默在世界银行发展经济学年会上进一步把上述思想运用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战略的研究中，并认为：能否提供和使用更多的创意或知识品，将直接关系到一国或地区经济能否保持长期增长。例如，毛里求斯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实施了开放政策，吸引了香港的企业家把新思想和知识品运用到那里，从而带动了该国经济发展，摆脱了赤贫状况。我国台湾则通过当局的积极作用，成功地激发本地人民创造新知识品并出口创汇。因此，如果不能持续地发现新思想的话，那么确实会限制增长。

人力资本理论肯定了人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并提出了提高人力资本的多元渠道。而新增长理论则深化了这个观念，突出了观念和思想创新的重要性，并且拓展了对知识和技能获得手段的认识，把实践和“干中学”也视为重要的手段，从而扩大了人才的标准，不仅要重视正规教育还要重视实践培训。美国的教育和培训体系就体现了这点。克林顿政府期间，除了继续执行前任政府制订的“2000年目标计划”之外又制订了“终身学习计划”、“由学校向工作过渡计划”、半工半读的“国民服务计划”、帮助青年上大学的“贷款改革计划”以及对失业工人的“再培训计划”等，并为这些计划拨款以保证其实现。美国每年用于知识的生产及其传播的开支约占其GDP的20%，其中教育开支占GDP的10%，培训和在职教育开支占5%。